

「寶硯山房」版扉頁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就閒堂」版扉頁 廣州美術學院祁小春教授藏 作者自攝



乾隆年間刻本《墨池編》扉頁 日本下野健兒先生家藏 作者自攝



乾隆年間刻本《墨池編》所附《印典》之扉頁 日本下野健兒先生家藏 作者自攝

# 清刻本《墨池編》版本源流考述

陳志平\*

【摘要】康熙五十三年（1714）「就閑堂雕版」的《墨池編》，是清代以來《墨池編》一切翻刻、重印之母本。「就閑堂」本在康、雍、乾三朝均有印行，版式全同，唯有挖改諱字及增減序跋等局部改變。雍正年間，康熙版「就閑堂」本經過「寶硯山房」翻刻和改頭換面，形成新的版本。「寶硯山房」本與「就閑堂」本除了牌記和在不同時期為增加避諱而有局部改動之外，餘則完全相同。乾隆年間，因為「進呈御覽」使得《墨池編》各本得到進一步完善，此後再無新版本出現。《墨池編》的清刻本系統因為依據的家藏正本「為鼠殘闕」，再加上整理時雜出眾手和據以參校的版本本身也存在問題等原因，文獻價值難厭人意。

關鍵詞：《墨池編》、清刻本、版本、源流、考述

北宋朱長文編撰的《墨池編》是繼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之後的一部書論叢輯著作，在中國書論史以及古代書家研究等領域中，《墨池編》與《法書要錄》一樣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獻。《墨池編》原本無存，目前存世的有三個版本系統分別是：1、清刻本系統，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就閑堂」刻本和雍正、乾隆「寶硯山房」刻本。2、明抄本系統，包括明橫野洲草堂抄本（以下簡稱「明抄本」）、譚公度本、《六藝之一錄》本（簡稱《六藝》）等。3、明刻本系統，包括薛晨刊本（簡稱「薛本」）、李時晨刊本（簡稱「李本」）、《四庫全書》本（文淵閣簡稱「淵本」、文津閣簡稱「津本」）。其中明抄本系統為筆者首次拈出，相關考證參見拙文〈新發現明橫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編》檢證〉<sup>①</sup>

---

\*暨南大學藝術學院 教授

① 陳志平，〈新發現明橫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編》檢證〉，《文獻》，2014年第3期，頁15-24。



清刻本系統雖然文字內容較為穩定，但版次複雜，一度讓人莫衷一是。吉林大學古籍所叢思飛博士學位論文〈唐代書法文獻研究〉（2013年）結合該校所藏兩種《墨池編》善本進行鉤稽，對於清刻本的版本源流有所論述。但限於聞見，疏漏之處亦復不少。今參諸同異，廣搜各本，考證源流，清理如下。

## 一、清刻本之始

清刻本始刻之緣由見於朱長文二十二世孫朱之勳作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跋：

之勳二十二世祖樂圃公闡明理學，餘擅書法，纂著《墨池編》二十卷，凡筆法之秘奧，名家之品評，以及歷代古碑、文房器用，靡不畢備。誠後學之津梁，書家之寶籙也。世藏正本，為鼠殘闕，訪求全帙足成。康熙辛卯（1711）、壬辰（1712）歲，先後得二部：一系勝國隆慶間四明薛晨刻本，一系萬曆間蘄水李時成刻本。薛板增損不倫，字款脫謬；李板即以薛氏本重刊，又將二十卷並而為六，均失本來面目。更有錢塘胡氏又割切碑帖二卷，另為一書曰《碑帖考》。卷端著書姓氏，將薛與勳祖兩家名字紐作一人，識者能不齒冷？行世類此。原本不可得見，嗣復多方購求。兒象賢獲舊抄一帙，紙色甚古，令與家藏摸覈，魯魚亥豕雖多，卻無薛李等家之謬，可稱善本，補續舊藏。甲午（1714）夏，授弟侄子孫輩分任校鋟，公之海內。力有不繼者，悉純孝及鋤戮力成之。厥工既定，附述雕板始末並流傳之舛偽如此。康熙甲午嘉平朔，長洲朱之勳謹識。②

這段論述中提到的幾種《墨池編》，根據筆者的整理研究，基本可以確定分屬於三個版本系統：「薛本」、「李本」及《碑帖考》為明刻本系統，另有「舊抄本」當與明橫野洲草堂抄本、「譚公度本」同屬於抄本系統，朱之勳所刻為清刻本系統。在朱之勳看來，「世藏正本」無疑是最佳的，由於「為鼠殘闕」，因此參諸各本則不可避免。

朱之勳此序作於「康熙甲午嘉平朔」，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初

---

② 清雍正年間就閑堂刻本《墨池編》卷末。

一日。擔任「校鈐」任務的「弟侄子孫輩」名單見於康熙及雍正「就閑堂」雕版的各卷末：

序	廿三世孫存孝重校
卷一	二十二世孫之勸重校
卷二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卷三	廿三世孫永孝重校
卷四	廿三世孫繩初重校（有印花）
卷五	廿三世孫韋玉重校
卷六	廿三世孫存孝重校（印花下半）
卷七	廿三世孫純孝重校（印花下半押字上）
卷八	二十三世孫韋玉重校
卷九	二十三世孫存孝重校
卷十	二十三世孫存孝重校（印花上半）
卷十一	廿三世孫承宗重校（印花下半）
卷十二	廿四世孫念慈重校
卷十三	廿四世孫惠慈、廷慈重校
卷十四	廿四世孫寶慈重校
卷十五	廿四世孫廷詔、恩慈重校
卷十六	二十三世孫繩初重校（印花下半）
卷十七	廿三世孫韋玉重校
卷十八	廿三世孫韋玉重校
卷十九	二十三世孫存孝重校
卷二十	二十三世孫韋玉重校

朱氏為蘇州望族，寶樹盈階，人才輩出，舉全族之力刊刻《墨池編》，允為一時之盛事。從「二十」不時刻作「廿」來看，此書校勘雜出眾手，難免有不洽之處。康熙原版乃「就閑堂雕版」，此版成為後來一切重刊、重印本之母本。「就閑堂」本在康、雍、乾三朝均有印行，版式全同，唯有挖改諱字及增減序跋等局部改變。在雍正年間，康熙版經過寶硯山房改頭換面，形成所謂「寶硯山房」本，「寶硯山房」為「就閑堂」的翻刻本，除了牌記和在不同時期為增加避諱而有局部校改之外，餘則與「就閑堂」本完全相同。

## 二、《印典》的刊附

康熙原版刊行之後，朱之勸「令孫輩又將清溪子《印典》八卷鐫板以附」，時間在雍正十一年王澍作序之前。

朱象賢，字行先，一名朱存孝，號清溪子，江蘇吳縣人，世稱「清溪先生」，別號「玉山仙史」。曾受業於楊賓（大瓢）、沈德潛（歸愚），生卒、生平不詳。傳世有《印典》八卷，另有《回文類聚》（宋桑世昌采輯，《補遺》一卷為朱象賢所補）。乾隆初作《聞見偶錄》，編入《昭代叢書》。上述朱之勸諸孫中「二十三世孫存孝」即是此人。

附刊《印典》並沒有對《墨池編》原版有什麼改變，只是在《墨池編》總目末頁加刻了「附《印典》八卷」字樣，而《印典》八卷則是另外刊版，然後二書編在一起。由於《印典》的存在，《墨池編》刻本系統變得複雜起來。這分三種情況：一種是總目末頁有「附《印典》八卷」字樣，而後實附有《印典》；第二種是《墨池編》總目末頁無「附《印典》八卷」字樣，而實際有《印典》附後者；第三種是總目末頁有「附《印典》八卷」字樣，而實際無《印典》附後。另一方面，從避諱情況看，《印典》和《墨池編》也多有不一致之處。由此可見，《印典》成書後，獨立印行，只是根據需要，將它隨機地編在《墨池編》末尾，於是出現了二書新舊版混合的各種情況。

從目前存世的附錄於《墨池編》後面的《印典》來看，有的扉頁有「就閑堂雕版」的牌記，有的則沒有。卷前均有不署年月的鈕讓序、朱象賢自序各一篇及書末的朱廷詔跋尾。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版本後多出作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白長庚跋一篇，且白（白長庚）、朱（朱廷詔）二跋的順序不同，有時白跋在前，有時白跋在後。筆者推測，《印典》起初刊附於《墨池編》時，只有鈕讓序、朱象賢自序和朱廷詔跋，時間在「康熙五十三年」至「康熙六十一年」之間。後來邀請康熙名士白長庚作跋，由於刊版先成，故補刻白跋並附於朱廷詔跋後。朱廷詔是朱象賢侄，而白長庚是專門延請的「外人」，為表示對白長庚的尊重，再次編輯時將白長庚跋移於朱跋之前。

### 三、關於王澍序

《墨池編》與《印典》刊成之後，二書合為一編，時間最遲在康熙六十一年白長庚作跋之前。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王澍路過吳門，朱氏邀請王澍為《墨池編》作序，王澍同時述及《印典》的刊刻始末：

……海虞毛氏《津逮秘書》列於目錄，是種闕而未刊，諒無善本故也。公之裔孫元秀先生，諱之勤，卓行孝思，吳人莫不奉為矜式。乃以家藏正本重付剞劂，字版精雅，較讎確當，誠非尋常書籍所可同日而語。編後令孫輩又將清溪子《印典》八卷鐫板以附。既得講求書法，並可探討筆硯、章印之精微，遊藝君子可無餘憾。余老而且病，言不成文，近過吳門，因覲校刊之妙，聊書數語以志大略云。雍正癸丑孟冬，琅邪後學王澍謹識並書。<sup>③</sup>

王澍序作於雍正十一年，是序為版刻王澍手跡而成，起初將「津逮秘書」之「津」字誤寫作「精」，此誤至今可從諸本考見，後在乾隆年間上呈御覽時挖改為「津」。王澍序置於《墨池編》之首，原版自然無需改變，而是否有王澍此序是判斷《墨池編》是否康熙原版的重要依據之一。

從傳世諸多清刻本《墨池編》來看，大部分有王澍序，無王澍序的本子不多見。筆者所知其一為南京圖書館編號為GJ3003320的本子，此本最接近康熙原版，理由如下：第一，「玄」、「鉉」缺末筆，「慎」不缺「末筆」；一般認為，「玄」乃避康熙諱，而「慎」乃避雍正諱。其二，每卷末有諸孫校正字樣。第三，總目末頁無「附《印典》八卷」字樣。雖然書後有《印典》八卷，但從「玄」、「慎」、「弘」字缺末筆來看，可確定是乾隆朝附益而成。且僅存朱廷詔一跋，而無作於康熙六十一年白長庚跋，可知據康熙間《印典》原版而來。第四，書前無王澍序，代之以朱象賢《印典》序。朱序當是刊附《印典》時移入，此時王澍序未成。

---

③ 清雍正年間就閑堂刻本《墨池編》卷首王澍序。

中山大學藏編號為1144的本子，與此本有相似之處。此本「玄」、「鉉」缺末筆，「慎」不缺末筆；每卷末有諸孫校正字樣；總目末頁無「附《印典》八卷」字樣，此皆與南圖本同。不同之處是書後無《印典》，而書前有王澍序，且王澍序中「津」作「精」，可推斷此本是在康熙原版基礎上增加王澍序而成，時間當然是在雍正十一年或稍後。

#### 四、「寶硯山房」本

康熙「就閑堂」原版流傳到雍正年間，除了有王澍序的加入之外，另發生了一次大的變化，就是寶硯山房據康熙原版進行改頭換面，由此形成了「寶硯山房」本系統（圖1）。「寶硯山房」本「刊行」之後，「就閑堂」版依舊存世（圖2），而且在乾隆年間多次印行。對照二版，發現除了牌記不同之外，其餘並無明顯不同之處。

吳縣朱氏「就閑堂」乃朱之勳所屬，此無疑問，但「寶硯山房」則不知何處。筆者曾見兩種「寶硯山房」本，其一為國家圖書館編號為15920的本子，另一種為北大索書號為SB739.1/2570.2的本子，二書卷首牌記均有「寶硯山房刊板」字樣。

國圖本書前有王澍序，「玄」避諱而「慎」不避，每卷末有諸孫校正字樣，國圖據此定該本為「清雍正十一年」。問題在於，雍正十一年重印時，正文中「慎」不避諱是否可行？叢思飛對此有考證，他引用《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諭旨」及《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百三十一「乾隆三十年」兩段文字，認為「據清制，書籍中避諱字限制在當下及其後刊刻，於之前刊刻之本並不追究，或聽其自便」。<sup>④</sup>筆者贊同此一結論，不再舉證。

國圖「寶硯山房」本與雍正間「就閑堂」各本並沒有明顯不同之處，並且保持了康熙「就閑堂」本的基本面貌。

---

④ 叢思飛，〈唐代書法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頁51。



北大本索書號為SB739.1/2570.2，亦有「寶硯山房」牌記，但與國圖本不同的是，其中「玄」、「慎」、「弘」皆諱，無諸孫校正字樣。附《印典》八卷，且白跋在朱跋之前，此本當為乾隆間重印。

北大「寶硯山房」本與國圖「寶硯山房」本的不同，恰如雍正「就閑堂」各本與乾隆「就閑堂」各本的不同，這是因為乾隆年間二本進呈御覽時經過了一次較為嚴格的修訂。

## 五、乾隆年間對《墨池編》的校改

乾隆年間，「就閑堂」原版經過了一次大的修訂和校改，表現為四個方面：其一是正文內容的校改；其二是刪除每卷末的諸孫校正字樣；其三是「真」、「慎」、「弘」字挖除末筆；其四是將王澍序中的「精」改為「津」；其五，有的版本增入沈德潛《琴史序》。

日本學者杉村邦彥先生藏有一種善本《墨池編》，後轉給祁小春教授，筆者得以寓目。此本為「就閑堂」雕版，前有王澍序，「津」作「精」，「玄」缺末筆，「慎」不缺，總目末頁有「附《印典》八卷」字樣，每卷有諸孫校正字樣。此本正文中有朱筆描改痕跡，與吉林大學古籍部所藏標注為康熙五十三年「就閑堂」本保持一致。當然此二本均為雍正間所重印，只不過較多地保留了康熙本原來的面貌而已。此描朱之處在乾隆間重印本中，均予以改正。茲將描朱校改之處匯錄如下：⑤

⑤ 表格中涉及一些書籍的簡稱：《法書要錄》傳本中的吳岫抄本（簡稱《吳錄》）、王世懋抄本（簡稱《懋錄》），此外有嘉靖本（簡稱《嘉錄》）、《王氏書苑》本（簡稱《王錄》）、毛晉《津逮秘書》本（簡稱《毛錄》），這三種為明刻本系統，合稱《要錄三種》，有時加上《吳錄》，合稱《要錄四種》。《藝文類聚》簡稱《藝文》，《太平御覽》簡稱《御覽》，宋刻本《書苑菁華》簡稱《宋苑》，《古今法書苑》簡稱《法書苑》，《式古堂書畫彙考》簡稱《式古》，《佩文齋書畫譜》簡稱《佩文》。

《墨池編》篇目及 校勘文字		《墨池編》各本							備註
		康熙本	乾隆本	明抄本	薛本	李本	淵本	津本	
1	卷六李嗣真《書後品》「彥倫意則甚高」	謙	倫	謙	謙	謙	謙	謙	《要錄四種》、《宋苑》作「倫」。按：周顒，字彥倫。
2	卷六李嗣真《書後品》「而欲乘欸段」	疑	欸	欸	疑	疑	欸	疑	《要錄四種》、《宋苑》、《法書苑》作「欸」。按：「欸段」，馬行遲緩貌。
3	卷八朱長文《續書斷》「明皇之弟」	王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按：明皇指唐玄宗。
4	卷十四盧元卿《跋尾記》「李孝恭」	李恭	李孝恭	李恭	李恭	李恭	李孝恭	李恭	《吳錄》、《嘉錄》、《王錄》作「李恭」，《毛錄》、《法書苑》作「李孝恭」。按：唐書有李孝恭，據改。
5	卷十四王方慶《進書疏》「神功元年」	初	神	初	初	初	神	神	按：「神功」乃武則天年號。
6	卷六庾肩吾《書品並略論》「庾亮字元規」	用	規	規	規	規	規	規	按：庾亮字元規。
7	卷七張懷瓘《書斷中》「書出於韋誕」	誕	誕	誕	誕	誕	誕	誕	按：「誕」為誤字。

8	卷七張懷瓘《書斷中》「光武建武」	平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按：建武乃晉元帝司馬睿年號。
9	卷七張懷瓘《書斷中》「 <b>章</b> 帝建初中」	明	章	明	明	明	明	明	按：「建初」為漢章帝年號。
10	卷七張懷瓘《書斷中》「 <b>昭</b> 與鐘」	明	昭	明	明	明	昭	昭	《要錄四種》、《宋苑》作「昭」。按：何焯校記云：「止稱『明』示避文王諱。」（晉人避司馬昭諱）
11	卷七張懷瓘《書斷中》「俱 <b>以</b> 」 書名」	不	以	有	不	以	以	以	《要錄四種》、《法書苑》作「有」。
12	卷八張懷瓘《書斷下》「和帝永 <b>元</b> 中」	初	元	初	初	初	初	初	原本以外之諸本作「初」，均誤。按：永初乃安帝年號。
13	卷八張懷瓘《書斷下》「祖騫梁侍中， <b>父</b> 規並有重名」	又	父	父	父	父	父	父	原本以外之諸本皆作「父」。
14	卷八張懷瓘《書斷下》「衛瓘索 <b>靖</b> 」	靖	靖	靖	靖	靖	靖	靖	原本以外之諸本均作「靖」。
15	卷八張懷瓘《書斷下》「亦叔 <b>重</b> 之亞也」	重	仲	重	重	重	重	重	原本不誤，乾隆本誤改。

16	卷八《書斷下》 (王導)「 <b>咸康</b> 五年卒」	咸 寧	咸 康	咸 寧	咸 寧	咸 寧	咸 寧	咸 寧	《吳錄》、《懋錄》作「咸平」。 按：王導卒年實為咸康五年。
17	卷八張懷瓘《書斷下》「范曄… … <b>元嘉廿二年</b> 伏 誅」	永 嘉 一 十 年	元 嘉 廿 二 年	永 嘉 二 十 年	永 嘉 二 十 年	永 嘉 二 十 年	永 嘉 二 十 年	永 嘉 二 十 年	《要錄四種》作「永嘉二十年」， 《法書苑》作「永嘉二年」，皆誤。 按：范曄謀反伏誅事在元嘉二十二年。

上表表明，乾隆本所作的校改比較嚴謹，除了改正康熙本明顯的錯字外，對於不易發現且沿誤已久的誤字也援引他書進行了校改。筆者起先懷疑乾隆版的改定乃依據雍正間描朱本而來，後來忽悟，當是乾隆版校改之後，後人在雍正本上據以校勘並標明而已，描改本不止一本即是佐證。

「就閑堂」版《墨池編》在乾隆年間除了以上的校改之外，有的版本在書前增入沈德潛（1673—1769）的《琴史序》，序文提到：

乙酉春仲，忻逢翠華南幸，以先生所著《易解》、《墨池編》、《續圖經》、《琴史》遺集四函恭呈御覽，請加嘉獎。皇上特賜「道園養素」匾額彪炳祠宇，千禩增輝，誠盛典也。⑥

沈德潛（1673—1769），字碣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清代詩人。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四年（1739）成進士，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為葉燮門人，論詩主格調，提倡溫柔敦厚之詩教。《印典》鈕讓序中提到朱象賢「及長，從楊大瓢、沈歸愚兩先生游。凡兩先生之所

⑥ 筆者所見有沈序的主要版本有：國圖編號為61295、北大圖書館編號為X739.1/2570、北大圖書館編號為X/6073/2970.07和四川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為01872的四種本子。沈德潛序置於書前。



學，行先兼學之，故以才猷見重於當世」。<sup>⑦</sup>

沈序落款為「乾隆丙戌夏五宮傳禮部尚書後學沈德潛撰並書」。「乾隆丙戌」指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一年「乙酉」乃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三十年正月，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閏二月初一，至蘇州。正是在此頃，朱氏後人以朱長文「所著《易解》、《墨池編》、《續圖經》、《琴史》遺集四函恭呈御覽」，此進呈本傳世有多種（吉林大學有藏），筆者訪學日本時曾在下野健兒先生家見到其中之一種，如（圖3）。

該書《墨池編》和《印典》扉頁均有「就閑堂雕板」牌記，並在《墨池編》扉頁上加蓋「進呈御覽」雙龍戲珠朱文印一枚。扉頁左上方有「進呈書帖目：《易經解》、《墨池編》、《琴史》、《續圖經》」小字兩行，與沈德潛的記述相合。書中「玄」、「慎」、「弘」缺末筆，序中「精」作「津」，無諸孫校正字樣，雍正版上的描改字全部改正，末附《印典》，《印典》扉頁有「就閑堂雕板」字樣（圖4），這應該就是《墨池編》的最後定本了。《墨池編》進呈御覽之後的次年，朱氏又將沈德潛序置於重印的各本之首，於是形成了有沈序的諸本。在有沈德潛序的各本中，還存在局部的差異，四川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有一種（索書號為01872），在《印典》前增入《書吳郡圖經續記後序》（包括常安民、林慮、祝安上、孫佑四序），可以想見，乾隆年間的《墨池編》也存在複雜的情況。

乾隆年間進呈御覽使得《墨池編》各本進一步得到完善，雍正年間的「寶硯山房」本在此間經歷了和「就閑堂」本一樣的校改，上述北大「寶硯山房」本與國圖「寶硯山房」本的不同即可從此探得消息。從此以後，《墨池編》在版本上沒有出現什麼新情況。

今存於世的《墨池編》清刻本不下數十百種，各大圖書館在敘述版本項時常常出現錯誤，就是因為對於清刻本之始末源流不甚了了。今綜合上述，將《墨池編》清刻本源流圖示如下：

---

⑦ 各本《印典》所載鈕讓序，均如此。



## 六、清刻本的價值

### （一）關於「家藏正本」

清刻本的底本來自「家藏正本」，通過與明抄本和明刻本的校勘，可以發現這一「家藏正本」有兩個特點：第一，有可能出自朱長文原本。第二，經過南宋人以後人的篡改。

朱長文在編撰完成《墨池編》後，曾進行過修改，除了原本外，還有修訂本流傳，這從書前自序和書中朱長文按語的修改痕跡可以看出來。

明抄本、明刻本和清刻本書前均載有朱長文自序，但是文字不同，分屬於兩個系列：明刻本為一版本，而明抄本和清刻本相同，別出另一版本。以下以清刻本序為底本，將明刻本（薛本）、明抄本（明橫野洲草堂抄本）與清刻本（朱氏「就閑堂」刊本）序的不同之處標注於括弧中：

始予年（薛作「余甫」）十歲時，家君嘗教以顏忠烈書（薛作「命習書，宗顏魯公」），日常（薛無此字）臨一紙，夜則內（薛作「納」）諸庭，吾親亦（薛無此三字）頗悅之。後益（薛作「稍」）長，則學為大經，慕前人著文辭（薛作「命學前人著文」，明抄本「大」作「六」），至於（薛作「有」）少隙（薛作「暇」），無它嗜好，亦（薛有「復」）以書為事，顧存心不專，而未得良師口傳指授，故卒不至於成（薛作「然心志雖專，惜未得名家指授，卒不至於成」）。既冠屬疾，坐臥床簀（薛作「小榻」）間。（薛有「力疾書之」）書多則勑，由是筆跡愈拙，然其心亦弗忘焉。（薛作「勑則投筆，撫枕一息，起而復書，如此十年，操心屈伸，運筆甚苦，視天下至樂，無踰於此。莫間寒暑晝夜，奚暇計死生」）。……治平三年丙午冬十月初五日（薛作「十有五日」）吳郡朱長文伯原序（薛作「書」）。

明刻本（薛本）自序的落款時間是「十月十有五日」，而清刻本和明抄本則是「十月初五日」，在時間上似乎晚了「十日」，且明刻本（薛本）文字較清刻本和明抄本更為簡勁有力，可知明刻本自序當是原書自序的修訂版。

與自序的情況相似的是，明刻本中的朱長文按語也與清刻本、明抄本多有不同。以下以清刻本《墨池編》卷十八中朱長文按語為例，將明刻本（薛本）、明抄本（明橫野洲草堂抄本）與清刻本的不同校勘於括弧中：

朱子（薛作「長文」）曰：「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薛作「著」）之臣，以忠義相高；山林（薛作「丘壑」）之士，以志操自處（薛作「任」）。至於建（明抄本無）一事、創一物，皆有欲（薛作「欲冀」，明抄本作「欲有」）以傳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薛作「欲」）思（明抄本無）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薛無）知夫（薛無）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飊石火之速。其至於七十（薛作「年躋七旬」）者幾希，而名之所（薛作「垂」，明抄本作「之所垂或千萬齡而」）無窮，是亦可尚也（薛有「已」）。

從校勘記看，明抄本與清刻本差別不大，可以理解為傳抄之訛。但是明刻本與清刻本不同之處很多，且明刻本的表達效果稍勝清刻本，應該是兩個不同的版本。

以上分析表明，自序和按語極有可能經過了朱長文自己的修改，從而留下了原本和修訂本。僅就序言和按語看，明抄本與清刻本更接近原本，而明刻本則更接近修訂本。清刻本所依據的「家藏正本」與明抄本接近，出自原本的可能性大。

其次，清刻本所依據的「家藏正本」闖入了南宋人的文字，應該是經過南宋以後人篡改的本子。

清刻本和明抄本按語中大量以「朱子」代替「朱長文」可見後人改竄的痕跡。此外，清刻本和明抄本序言中出現的「顏忠烈」的稱號洩露了天機。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三「紹興三年三月庚申」條：「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真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sup>⑧</sup>既然顏真卿「忠烈」之名號出現於南宋，則可推知清刻本和明抄本已經不是原貌。

## （二）朱氏後人對清刻本的校勘整理

清刊本雖然以「家藏正本」為底本，但因「為鼠殘闕」，故非完帙。朱之勸聲稱「原本不可得見」，「訪求全帙足成」，詳情已經不得而知。他提到了薛本、李本以及另一來歷不明的舊抄本。認為舊抄本「紙色甚古，令與家藏摸覈，魯魚亥豕雖多，卻無薛李等家之謬，可稱善本，補續舊藏」，這一舊抄本極有可能屬於明抄本系統中的一種。朱氏後人在整理清刻本的過程中，必然做了一些「去偽存真」的工作，這約略可以考知。

如明刻本卷二王逸少《筆陣圖》中有一段文字：

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

---

⑧（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冊2，頁1078。



明抄本與明刻本大致相同，唯「之許下」和「之洛下」分別作「之許」、「之洛」。清刻本則略去劃線部份文字，刪改成：「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見李斯、曹喜等書；又見鐘繇、梁鵠書；又見蔡邕石經。」諸本此文後均有朱長文按語云：「舊本謂羲之嘗渡江，北遊名山，之許洛觀碑。據東晉時許、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刪去之。凡事理不通者，皆仿此。」據此，則清刻本因為保留了刪改的痕跡而最為近真，而明抄本、明刻本皆失實。清刻本接近《墨池編》原本的地方，雖然有可能是「家藏正本」的本來面目，將之歸為朱氏後人校改而成似無不可。

從大體上看，清刻本所依據的「家藏正本」與明抄本較為接近，但是在不少地方又表現出偏離明抄本而與明刻本相一致之處。如薛本卷十九《器用》中濫入南宋王邁的《臞軒筆銘》以及無名氏的《硯滴銘》，卷二十濫入《東觀餘論》等，皆不見於明抄本，而見於清刻本，不排除是朱氏後人據明刻本抄入。

又如清刻本和明刻本卷一《文字志錄目》所載書家名單比明抄本多出30人，其中包括齊、梁、陳書家若干人，王愔為宋、齊間人，不可能預為此事，且此30人名字不見於《要錄四種》、《宋苑》，因此必為後世竄入。從朱長文編撰此書的體例看，不合情理之處一般都會做刪改處理，不會出現這樣重大的失誤。明刻本和清刻本均失實，此處也極有可能是清刻本沿襲了明刻本之誤。

朱氏後人在整理清刻本時，有不合理之處會進行改動。如清刻本卷八《書斷下》「繫論」之「聞我皇之所好」，「我皇」《要錄三種》（《吳錄》脫漏此段）、明抄本、《墨池四種》、《法書苑》作「我后」。按：此文撰於開元甲子，故不能稱「我后」，當為朱氏後人所改。有時候，朱氏後人會對異文作校勘，並留下校勘記。如清刻本卷四《上武帝啟》「過為論（一作淪）弱」，其中括弧中小注不見於各本。唯明刻本和《要錄三種》、《宋苑》作「淪」，《吳錄》作「溺」，明抄本作「論」。括弧中的校注當是朱氏後人所增。

朱氏後人在整理清刻本時，除了有可能參考過明抄本和明刻本並據以校勘之外，還對篇目也進行了處理。如清刻本卷二正文中在王羲之《草書勢》後錄入《進書訣表》一篇，書前總目作「草書勢（後附獻之）」此文即傳為褚遂良臨王獻之《飛鳥帖》，有墨蹟傳世，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初編》有著錄，其文即本篇。《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六藝之一錄》

二百七十一據以收錄題作《晉王獻之自論書》，並在文末注明「飛鳥帖」。  
《墨池編》除清刻本外，諸本無此篇。薛本此處乃《唐僧懷素草書歌行》，篇末注云：「此篇本藏真自作，駕名李太白，前人已有辨證。」而明抄本及《六藝》所載《墨池編》兩篇皆無，且李白從時代上不當置於唐太宗之前，疑此兩篇均非朱長文原書所有，當為後人濫入。

### (三) 清刻本之失

在《墨池編》諸本中，由於清刻本流傳較廣，且經過朱氏後人整理之故，被後人譽為「善本」，但經過與明抄本和明刻本相校，發現清刻本訛誤之處比比皆是。主要表現是：

- 第一、 清刻本沿襲了明抄本之誤。如例1~6。
- 第二、 清刻本沿襲了明刻本（薛本）之誤。如例7~11。
- 第三、 清刻本自身致誤。如例12~27。
- 第四、 清刻本和明抄本、明刻本均誤。如例28~32。

《墨池編》篇目及校勘文字			清 刻 本	明 抄 本	明刻本系統				宋 苑	備註
					薛 本	李 本	淵 本	津 本		
1	卷二《唐太宗指 意》	以[心]為 筋骨	心 毫	心 毫	心	心	心	心	無	《法書苑》作 「心」。
2	卷三《陸希聲傳 筆法》	刁[衍]	怨	怨	術	術	術	衍	無	按：刁衍（945 —1013），西崑 體詩人，仕南唐 為秘書郎，後 隨李煜入宋。

3	卷五《與石守道推官書二首》	飲茗	茗	茗	茗	茗	茗	茗	茗	無	按：當作「茗」。
4	卷十一《書勢》	類阿那以羸羸	頓	頓	頽	頽	頽	頽	頽	類	《藝文》、《御覽》作「頽」，《法書苑》作「類」。
5	卷十一《飛白書勢》	世絕常妙	常施	常施	施常	施常	施常	施常	施常	施常	《藝文》作「施常」，《書斷》作「絕常」。
6	卷十一《上東宮古跡啟》	表揚泉之賦	全	全	泉	泉	泉	泉	泉	泉	當作「泉」。
7	卷一《說文序》	又以八體試之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當作「又」。
8	卷一《干祿字書序》	任別詢舊則	例循	脫	例循	例循	例循	例循	例循	別詢	碑刻本作「別詢」。
9	卷二《筆法十二意》	其次識法	諸	識	諸	諸	諸	諸	諸	識	《墨藪》作「識」。 <sup>⑨</sup>
10	卷二《書論四篇》	鬱拔縱橫如古隸書	跋	拔	跋	跋	跋	跋	跋	拔	《要錄四種》作「拔」。

⑨（晚唐）韋續纂輯，〈張長史十二意筆法第十一〉，《墨藪》，叢書集成初編，冊1621（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5。

11	卷十四《跋尾記》	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臣)姜行本	州	州縣	州	州	州	州	州	川縣	《吳錄》作「□縣」，《要錄三種》、《法書苑》作「川縣」。按：《舊唐書》卷三九〈地理二·山南西道〉：「通川：漢宕渠縣地，分置宣漢縣，屬巴郡；後魏改為石城縣，梁於縣置萬州，元魏改為通州，隋為通川縣。」 <sup>⑩</sup>
12	卷一《干祿字書序》	賁合經注本文	務	脫	貴	貞	貴	貞	貴	貴	《六藝》作「貴」。 <sup>⑪</sup>
13	卷一《說文序》	皆不合孔氏古文	人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當作「文」。
14	卷一《干祿字書序》	去泰去甚	其太	泰去	太去	太去	太去	太去	泰去	泰去	碑刻本作「去泰去甚」。

⑩ (清)倪濤撰，《六藝之一錄》，卷二六九，文津閣四庫全書，冊274-276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182。

⑪ (後晉)劉昫等撰，〈地理二·山南西道〉，《舊唐書》，卷三九 (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1532。



15	卷一《小說序》	並約籀 文	留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宋苑》所載 賈耽原序亦作 「約」。
16	卷一《三字孝經 序》	昭文館 臣句中 正	詔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無	按：當作「昭」。
17	卷一《十八體 書》	鳴埵有 懷	壞	懷	懷	懷	懷	懷	懷	無	碑本作「懷」。
18	卷二《晉衛恒四 體書勢》	復有六 書	為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晉書》作 「有」。 <sup>⑫</sup>
19	卷二《筆陣圖》	見張昶 《華嶽 碑》	旭	昶	脫	脫	昶	脫	昶	昶	按：當作「昶」。
20	卷二《書論四 篇》	即須作 數種意	意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按：當作「種」。
21	卷二《唐太宗論 書》	書學小 道	學 書	書 學	書 學	書 學	書 學	書 學	書 學	無	《要錄四種》、 《御覽》作「書 學」。
22	卷二《用筆論》	行行眩 目	懸	眩	眩	眩	眩	眩	眩	無	按：當作「眩」。
23	卷四《晉王羲之 自論》	張草猶 當雁行	章 草	張 草	比 張 芝 草	比 張 芝 草	比 張 芝 草	比 張 芝 草	比 張 芝 草	張 草	《要錄四種》、 《法書苑》作 「張草」。

⑫（唐）房玄齡等著，衛恆傳附《四體書勢》，《晉書》，卷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冊2，頁1063。

24	卷四《答錄古來能書人名》	臨菑侯 <b>文學</b>	又	文學	文學	文學	文學	文學	文學	按：當作「文學」。
25	卷四《答錄古來能書人名》	忽忽不暇 <b>草</b>	學	草	草	草	草	草	草書	《要錄四種》作「草書」，《說郛》作「草」當是。 <sup>⑬</sup>
26	卷五《與石守道推官書二首》	<b>勤</b> 心	動	勤	勤	勤	勤	勤	無	按：從下文言「怠」來看，當作「勤」。
27	卷五《與石守道推官書二首》	修 <b>少</b> 與時人相接尤寡	乃	少	少	少	少	少	無	《歐陽文忠公集》作「少」當是。 <sup>⑭</sup>
28	卷一《小說序》	<b>廣政</b> <b>十二年</b> <b>三月日</b> <b>林罕序</b>	脫	脫	脫	脫	脫	脫	有	據《宋苑》補補。
29	卷二《晉衛恒四體書勢》	禾卉 <b>莽</b> 尊以垂穎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晉書》作「莽」。 <sup>⑮</sup>
30	卷十一《書勢》	玄熊對 <b>踞</b> 于山嶽	路	路	路	路	踞	踞	踞	《藝文》、《御覽》作「踞」。

⑬ (元)陶宗儀輯，《說郛》，載《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4042。

⑭ (宋)歐陽修撰，〈與石推官第一書〉，《歐陽文忠公集》，卷六六，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9。

⑮ (唐)房玄齡等著，衛恒傳附《四體書勢》，頁1062。

31	卷十四《題右軍〈樂毅論〉後》	此書 <b>留意</b> 運工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留意	《要錄四種》、 《法書苑》作 「留意」。
32	卷十四《進書疏》	<b>神功</b> 元年 五月	初	初	初	初	神	神	無	按：「神功」乃 武則天年號。

造成清刻本訛誤頻出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還在於底本「為鼠殘闕」，整理時雜出眾手和據以參校的明刻本和明抄本本身也存在問題等三方面。由此可見，清刻本《墨池編》文獻價值要大打折扣，關於《墨池編》和古代書學文獻的校勘整理工作的確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要走。

## 餘論

相對於中國書法史的研究，書論研究一直是薄弱環節，尤其是古代書論文獻的整理工作更是嚴重滯後。《墨池編》與《法書要錄》、《書苑菁華》一樣，都是古代極為重要的書論叢輯，三書除了《書苑菁華》有宋本傳世外，其餘二書原本均不存。三書在後世傳本眾多，頭緒紛繁，加之內容交叉，在流傳過程中又相互影響，探討任何一本書都必須以解決另外兩書的版本問題為前提，這無形之中增加了整理的難度，同時也說明了版本源流的清理整理工作有多麼重要。筆者不揣鄙陋，試圖以《墨池編》為突破口，十年於斯，略有所得：一是將《墨池編》和《法書要錄》的版本源流基本釐清。已經發表的論文有〈新發現明橫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編》檢證〉（《文獻》2014年第3期），〈《法書要錄》的兩個版本系統及相關問題考述〉（《文藝研究》2018年第2期），待發的論文有〈《墨池編》明刻本版本源流檢證〉、〈《墨池編》清刻本版本源流檢證〉（即此文）、〈《法書要錄》與《墨池編》——從版本交侵和文獻互證的角度看〉、〈《墨池編》文獻來源考〉、〈明清書學叢輯中的《墨池編》〉等論文。二是《《墨池編》校證》一書基本告竣。筆者的做法是，以清刻本《墨池編》為底本，將所有《墨池編》、《法書要錄》的各

種版本和《墨藪》（明刻本）、《太平御覽》（宋刻本）、《太平廣記》（明刻本）、《書苑菁華》（宋刻本）、《古今法書苑》（明刻本）、《六藝之一錄》（清抄本），同時包括一些單行文獻和拓本等進行匯校，這樣建立一個文獻校勘的坐標系，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宋以前書論文獻的版本和文字差異問題，從而為當代書學研究留下一部紀念碑性的著作。

當然，筆者的研究都是分步進行的，在沒有看到全部成果和最終結論之前，每一步的價值還未能得到充分的凸顯，所以，小文旨在投石問路，以期得到更多的研究者和同行的關注。另一方面，本文不光是對於解決書論文獻版本問題有一得之見，其意義還在於為古籍版本的翻刻複印導致的新舊版混合編輯以及文字校改問題的研究提供一個生動的個案，同時也糾正了各大圖書館在著錄清刻本《墨池編》時出現的模稜兩可和錯誤的資訊。

後記：感謝《美術史研究集刊》刊發此文，同時感謝兩位審查人提出的寶貴意見，文中任何錯誤均由本人自負。

（責任編輯：陳卉秀）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明)王世貞撰

《古今法書苑》，王乾昌刻本，中山文獻館藏。

(清)王原祁、孫岳頌等纂輯

《佩文齋書畫譜》，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1883。

(宋)朱長文纂

《墨池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橫野洲草堂抄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國家圖書館藏明薛晨刊本，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李時成刊本，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GJ3003320的康熙「就閑堂」刊本，中山大學藏索書號為1144的雍正「就閑堂」刊本，杉村邦彥先生藏雍正「就閑堂」刊本，日本下野健兒先生藏乾隆「就閑堂」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索書號為SB739.1/2570.2的乾隆「寶硯山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索書號為X/6073/2970.07的清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5920的雍正「寶硯山房」本，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為61295的乾隆「就閑堂」本，吉林大學古籍部藏標注為康熙五十三年「就閑堂」本，四川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為01872的清刻本。

(宋)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宋)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重新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63。

(唐)房玄齡等著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晚唐)韋續纂輯

《墨藪》，叢書集成初編，冊1621，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倪濤撰

《六藝之一錄》，文津閣四庫全書，冊274-276，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晚唐)張彥遠撰

《法書要錄》，國家圖書館藏吳岫抄本，國家圖書館藏王世懋抄本，上海圖書館藏嘉靖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載《王氏書苑》本，毛晉《津逮秘書》本，范祥雍點校本等。

(宋)陳思撰

《書苑菁華》，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冊150，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元)陶宗儀輯

《說郛》，載《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後晉)劉昫等撰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 歐陽修撰

《歐陽文忠公集》，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唐) 歐陽詢輯

《藝文類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近人論著

叢思飛

2013 〈唐代書法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51。

Cong, Si-fei

2013 “Tangdai shufa wenxian yanjiu (A Study of Calligraphy Bibliography in the Tang Dynasty),” Changchu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Jilin University, p. 51.

陳志平

2014 〈新發現明橫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編》檢證〉，《文獻》，第3期，頁15-24。

Chen, Zhi-ping

2014 “Xinfaxian minghengyezhoucaotang chaoben Mochibian jianzheng (A Study on a Newly Discovered Handcopied Edition of *Mochi Bian* by Hengyezhou Cottag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Documentation*, no. 3, pp. 15-24.

## 圖版出處

- 圖1 「寶硯山房」版扉頁，中山大學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 圖2 「就閑堂」版扉頁，廣州美術學院祁小春教授藏，作者自攝。
- 圖3 乾隆年間刻本《墨池編》扉頁，日本下野健兒先生家藏，作者自攝。
- 圖4 乾隆年間刻本《墨池編》所附《印典》之扉頁，日本下野健兒先生家藏，作者自攝。





圖1 「寶硯山房」版扉頁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圖2 「就閒堂」版扉頁 廣州美術學院祁小春教授藏 作者自攝





圖3 乾隆年間刻本《墨池編》扉頁 日本下野健兒先生家藏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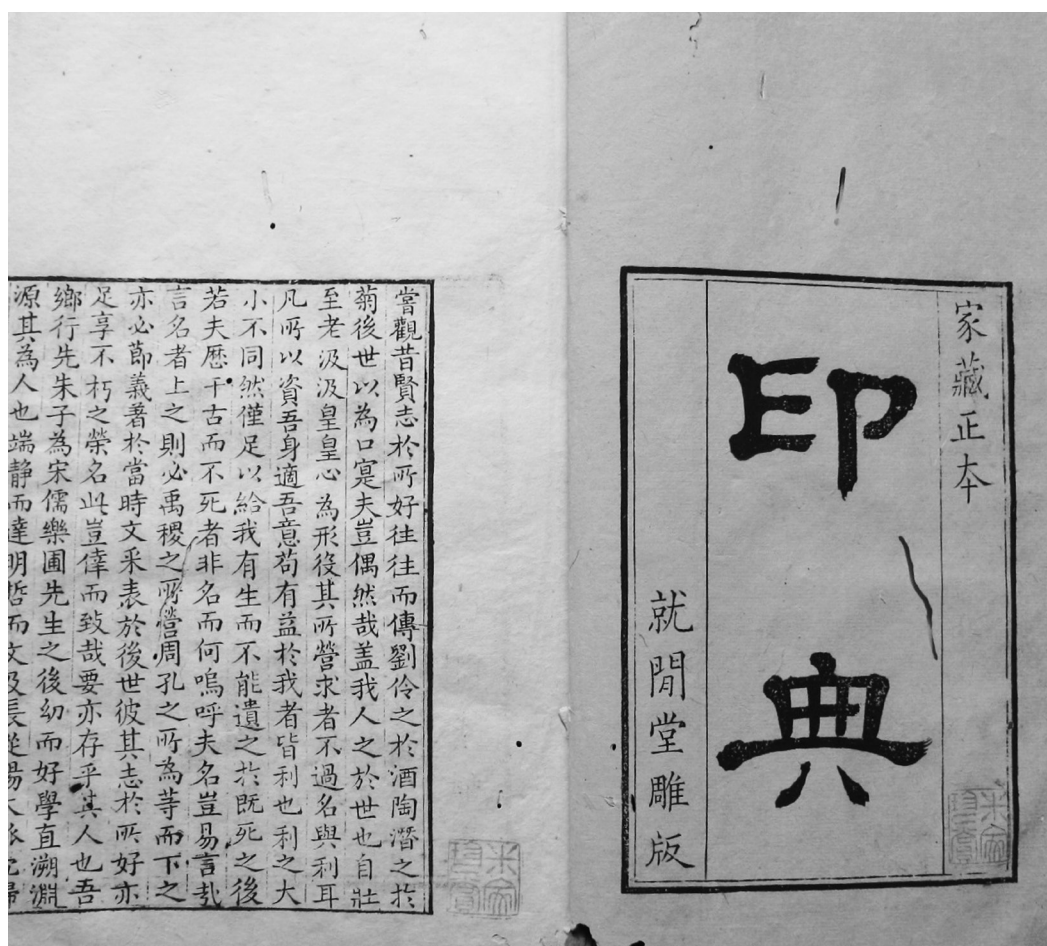


圖4 乾隆年間刻本《墨池編》所附《印典》之扉頁 日本下野健兒先生家藏 作者自攝

# **A Trace to the Source: The Qing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Mochi Bian***

**Chen, Zhi-ping**

Arts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Mochi Bian*, published by Jiuxiantang in the 53rd year of the Kangxi perio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714), is known as the origin of all the other editions or copies that have been produced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Jiuxiantang edition had been republished with minor changes, such as removing or altering taboo characters and adding or removing prefaces or postscripts, from Kangxi to Qianlong.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zheng, the Jiuxiantang edition was republished by Baoyanshanfang with negligible changes in the colophon and taboo character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ll editions of *Mochi Bian* had been proofread and improved so that a correct version could be presented to Qianlong Emperor for his review. From then on, no more new editions were produced. However, the original copy of *Mochi Bian* from an earlier time, which all the Qing editions had referred to, was unexpectedly damaged by mice. Furthermore, the existing Qing editions suffered problems such as mistakes caused by collaborative proofreading and deficient referential versions. Consequentl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Qing editions fo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s compromised and remains undetermined.

**Keywords:** *Mochi Bian*, Q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version, trace to the source